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十編 第3冊

北宋新黨文人文學研究

吳肖丹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 編

曾 永 義 主 編

第 3 冊

北宋新黨文人文學研究

吳 肖 丹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北宋新黨文人文學研究／吳肖丹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4+29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編；第3冊)

ISBN 978-986-322-904-9 (精裝)

1.宋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8

103014141

ISBN-978-986-322-904-9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 編 第三冊

ISBN：978-986-322-904-9

北宋新黨文人文學研究

作 者 吳肖丹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年9月

定 價 十編 18冊(精裝) 新台幣 32,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北宋新黨文人文學研究

吳肖丹 著

作者簡介

吳肖丹，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廣州文藝批評家協會成員。師從戴偉華教授從事唐宋文學研究，在《華南師範大學學報》、《南昌大學學報》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 10 篇，參與國家社會科學專案 1 項，曾獲「廣東省研究生學術論壇優秀論文」等獎勵，在《羊城晚報》等報刊發表專論 10 餘篇。

提 要

學界對熙豐黨爭、北宋黨爭與文學的關係、舊黨文人及文學的研究，比較充分，但對新黨文人及文學的研究則未全面展開。新黨文人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以支持參與熙豐變法、在變法引發的文人分野中從屬王氏一派的中央官僚為主體，這些對政壇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不乏學術與文學皆有突出成就者。自南宋以來「君子不道」的處境及因此導致的新黨文人詩文集的散佚，使新黨文人及文學在文學史上處於被遮蔽的狀態。作為改革派，新黨文人與保守的舊黨文人在地域文化傾向、出身階層和學術取向上存在許多差異。他們大多通過科舉入仕，不乏狀元、舉進士甲科的英才，以文學、經術為畢生事業，有豐富的著述；新舊黨人不因政見影響的交往，比比皆是。

本書擇取了創作材料較為充分的新黨文人，大體以他們與王安石、熙豐變法的關係為序展開探討。王荊公體與新學的精神有密切的聯繫。其他新黨文人稟性各異，學術各有所長，仕途經歷、心態也有所不同，兼之地域、家族、交遊等多種因素，都與他們文學創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是本書多角度展開文學研究的基礎。這些文人展示了新黨文人多樣化的群體生態，也以突出的成就證明了他們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目

次

緒論 北宋新黨文人——文學史上被遮蔽的群體	1
第一節 「君子不道」到被遮蔽的文學史地位	1
第二節 正名的迫切與困境	5
第一章 新黨文人與北宋中後期政治	17
第一節 「新黨」定義的發展	17
第二節 新黨與新法	
——中央官僚隊伍的改革派文人	19
一、熙豐變法與新舊黨矛盾的不可調和	19
二、熙豐變法的中央新黨隊伍	23
第三節 新黨與黨爭	
——從熙豐到崇寧年間的文人分野	29
一、熙豐年間	29
二、元祐年間	30
三、紹聖、元符年間	33
四、建中靖國、崇寧年間	33
第二章 北宋新黨文人群體特徵	
——以舊黨為參照	35
第一節 地域：新黨文人多南人的統計及其文化背景	35
一、新黨多南人的統計	35

二、南北文化背景差異與黨爭的關係	38
第二節 階層：科舉制度下故家大族與新進階層的仕途空間	45
一、熙豐新舊黨人出身的差異	45
二、階層轉化的可能性及新舊黨的對策差異	48
第三節 史論：從筆記到史書對新黨文人的醜化	63
一、「禍國」論的基調和「小人」的論斷	63
二、筆記到史書對新黨文人的醜化	68
第三章 北宋新黨文人的文學成就及文學史地位	77
第一節 北宋新黨文人在當時文壇的表現	77
一、科舉英才	77
二、詞臣翹楚	80
三、文壇名家	83
第二節 新黨文人的唱和	86
一、送程師孟知越州	87
二、題王維《江干初雪圖》	94
第三節 新黨文人的著述留存和在文學史上被遮蔽的狀態	97
一、新黨文人文學創作及流傳	97
二、選集、文論的「政治大體」和文學史的書寫	103
第四章 新黨領袖——王安石	109
第一節 荊公新學的確立到禁燬	109
一、「荊公新學」的建構到確立	110
二、新學的異化——從神壇到衰落	112
第二節 新學與王安石的詩歌	115
第五章 南豐二曾和蒲城章氏	119
第一節 曾布、曾肇的政治立場與家族利益	119
第二節 曾鞏文風對曾布、曾肇的影響	126
第三節 曾肇詩歌對王荊公體的繼承——兼辨析「詩如詞」的評論	130
第四節 「奇男子」章惇跟蘇軾的友誼	133
第五節 章惇的書論與文章	141

第六章 王氏門生陸佃	145
第一節 陸佃的仕履與王安石、新法	145
一、謙厚的處世態度	147
二、「剛直有守」與神宗實錄案	148
三、陸佃與王安石、新法的關係	150
第二節 訓詁學、道學、兵學的成就	154
一、《埤雅》代表的新學價值取向	154
二、陸佃的家學——道學與兵學	156
第三節 法義山溯子美的七言律詩	158
一、師友唱和的寄託	159
二、貶謫詩的創作高峰	163
三、潁州詠紅藥組詩的戀闕深情	167
第四節 「能文陸左丞」的穩重文風	171
一、經儒的制策	171
二、雅潔的散文敘論	173
三、寄託深情的章奏	175
第七章 黨爭中的異數——彭汝礪	177
第一節 被《宋史》褒揚的新黨人物	177
一、言動取捨，必度於義	177
二、直言極諫事迹	178
第二節 「行義迢迢有歸處」 ——兼論與王安石新學關係	185
一、師倪天隱宗胡瑗	185
二、援禪入經義	188
第三節 感憂困慕恬退的詩歌 ——與入世態度的互補	193
一、贈答契友——匡護正義共進退	194
二、悲白髮——生命力流逝的歎息	199
三、思鄉念親——仕與養的兩難	201
四、行路難——行役的艱苦無奈	202
五、士不遇——窮困命運的離騷	204
六、歸去來兮——生計與自由的矛盾	206
第四節 「詞命雅正，有古人風」的文章	211
一、有補於世的文道觀與本於「誠」的議論	211
二、諫諍的骨氣與平實的散筆	212

第八章 「安石鷹犬」——張商英	215
第一節 仕履與變法	215
一、辯論縱橫與事功精神	215
二、長期外放的仕履與執著改革的態度	220
第二節 學術與地緣的關係	224
一、張商英與蜀地文人的交往	224
二、兼容雜學近蘇洵	228
第三節 超脫的禪道思維與詩歌	231
一、屢挫不敗的凌雲之志	232
二、鋒芒畢露的翻案詩	234
三、心無掛礙的遊歷	236
第四節 「浩蕩」、「曠達」的宗旨與散文	239
一、「憤」、「思」、「情」、「氣」的創作要素	239
二、高遠的主旨與犀利的鋒芒	240
三、鋪排列論的文氣——蘇洵文風的繼承者	242
第九章 「壬人」沈括	245
第一節 心志與仕途變化的關係	246
一、從「十年試吏」、進士及第到為神宗賞識	247
二、永樂之役後的自閉	249
第二節 親近晚唐的詩論與詩歌	250
一、注重「涵詠餘味」的詩論	251
二、婉麗精工的小詩	253
第三節 博學研煉與自鑄新語	257
一、遠離「議論爭煌煌」的態度和鑽研文字	257
二、「未敢決然自信」的議論筆談	260
三、「典而不佻」的四六	262
四、自閉後的莊屈之「夢」	263
第十章 蘇軾的友人——蒲宗孟、蔣之奇	267
第一節 蒲宗孟的「侈汰」和與蘇軾的交往	267
第二節 蒲宗孟的性情與詩文	271
第三節 蔣之奇與歐陽修、蘇軾關係	274
第四節 蔣之奇的遊歷與詩歌	276
第五節 事功精神與考據文章	280
結 語	283
主要參考文獻	287

緒論 北宋新黨文人 ——文學史上被遮蔽的群體

熙豐變法，是影響北宋政治局面的重大舉措，它將士大夫自慶曆新政因政見而引發的黨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開啓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朋黨之爭，延續時間之長、波及範圍之廣、產生影響之烈，在歷史上極爲突出。正如柳詒徵先生指出的：「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爲然。」^{〔註1〕}黨爭政治中士大夫既有主動發起參與者，亦有欲中立者而爲其裹挾不能自己，將當時仕途上絕大部分的文人驅使到兩個對立的陣營，兩大力量裏又各有派別，由舊黨攻訐新黨開始，凡事必以己方爲是，非此即彼，無調和協商之可能，至後期甚至演變至依靠統治者的信任掌權，迫害對手、排擠同盟。新舊黨皆以真儒自命，治國必以行自身政治理想而無兼容之量，雖處於士大夫參政條件最爲優渥的時代，仍脫離了朝政國計的部分事實，深陷黨爭的泥沼，雖有制度上的缺陷，也是文人思維的痼疾使然，身處黨爭的文人，命運、心志與創作也因此開拓了另一層空間，他們與黨爭的關係之密切超越了其他朝代，他們後世流傳的文壇名聲也因此判若雲泥。

第一節 「君子不道」到被遮蔽的文學史地位

熙豐變法中士大夫因政見不同而漸次判分的兩黨，學界將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文人稱爲新黨，反對變法的文人稱爲舊黨。新黨士大夫與舊黨士大夫的

〔註1〕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十九章《政黨政治》，三聯書店，2007年，第521頁。

主體性質並無不同，因為他們「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才」，「政治家、文章家、經術家三位一體，是宋代『士大夫之學』的有機構成」〔註2〕，新黨群體雖從政治角度劃分，也應有文學垂範，因黨爭與文學的互動，新黨的言論也不應如今日所見多為間接材料，在以文學取士的時代，欲與人才濟濟的舊黨爭長短的新黨無相當才俊可表，也不符合事實，但文學史就是如此自然地略過這部分文人。文學的研究，從地域上講，有強勢文化區、弱勢文化區〔註3〕，從群體上講，尤其是與文人命運攸關政治群體，有顯在的群體和被遮蔽的群體，新黨文人在文學接受史上被刻意忽略，不過數代便已成定局。下文真德秀的議論，在揭示他們被遮蔽的事實上很有代表性：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王珪）、呂惠卿、林子中（林希）、蔡持正（蔡確）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註4〕

至真氏時，新黨文名已湮沒，真氏才要與後輩強調他們「亦非無文章」，是不受主流話語歡迎。自命君子的理學家刻意不提新黨的文學，讓其處於被遮蔽的狀態，其毀滅性不亞於官方詔令禁燬。從他的議論看，新黨的王珪、呂惠卿、林希、蔡確也是文學家，但被道學家列爲小人，讀其文章也有精神污染的可能，所以「君子不道」。

新黨文人參政進而參與黨爭，政治清算勢必打壓文人、消滅其言論。黨爭政治對文學的踐踏是酷烈的，士大夫們從深文周納爲黨爭服務擴大到從禁燬「立言」去消滅對手，一路朝非理性的道路飛奔，新黨文人的文章、學術的命運，與黨爭的起落基本一致。文字獄如「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神宗實錄案」，新舊黨對異黨文字傳播的打擊不相伯仲。黨禁對異黨的學術、文學等直接進行全面封殺，進而排擊對手，愈演愈烈，始於舊黨，元祐「更化」禁燬「荆公新

〔註2〕 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7頁。

〔註3〕 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中華書局，2006年，第161頁。

〔註4〕 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2，中華書局，1983年，第34頁。

學」，而紹聖「紹述」新黨則禁「元祐學術」，至崇寧「新學」被用作專制的工具，禁「元祐學術」，也順帶禁了不少新黨文人的文字。逮至宋室南渡，統治者「最愛元祐」，「新學」被推下神壇，「紹興更化」，舊黨得到平反，尤其是洛、蜀兩黨的門生故舊得到起用，「江西詩派」、「蘇軾詞派」、「道學文派」相繼崛起，而新黨卻後繼乏人，「新學」發展停滯，並再次被秦儉黨歪曲利用，至理宗朝，道學黨主政，程系道學確立正統位置，「新學」在道學派抱團攻擊下漸失科場顯學地位，並徹底地被清除出思想界，新黨文人文學名聲不彰。自此，道學從在朝到在野，掌握了主流話語權，編排門戶宗派，指點評論文壇，餘響綿延元、明、清，舊黨文字隨道學大昌而進一步得到整理傳播，新黨文字在「不道」的傳統下，甚至不用官方直接禁燬其文字，便逐漸淡出了文學史。

除了黨爭，學術之爭對新黨文人文學的遮蔽更是決定性的。對新黨文人文字的一大打擊在南渡初，統治者和理學家將亡國的責任推到了王安石變法頭上，其邏輯牽強，但卻影響深遠，大量杜撰醜化新黨文人形象的筆記，也逐漸出現。靖康起用的元祐後人歪曲事實，左右朝堂論斷，程頤弟子楊時的議論堪為代表：

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朝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眾，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為異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以導人主，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斥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感。〔註5〕

學案中楊時這段議論，來自他靖康元年的《上欽宗皇帝書》，清算「新學」不遺餘力，對理學的壯大影響巨大。他雖指明蔡京「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下文

〔註5〕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宋元學案》卷二十五《龜山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946頁。

仍把是非顛倒，「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邏輯混亂，難怪胡宏不解史書為何載此「迂闊」之論，胡安國指出此乃「直取王氏心肝底僧子手段」〔註6〕，為排擊異黨異學，不問手段。楊時與同時理學家類似的議論連篇累牘，他們群起奪取新學科場地位的行爲也受到了士子的抵制，但是王安石被推下神壇，為道學地位上昇打開了一個缺口。

更大的打擊來自朱熹的論斷，奠定了後世論調基礎，他雖不能不肯定王荊公人格，但卻徹底否定其思想學術及擁護這種學術的新黨文人，在道學一統天下甚至成爲文化桎梏的後世，便只存在他這一個結論。貌似一分爲二客觀平和，實則對新黨新法全盤否定：

公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器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以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註7〕

認爲王安石禍國的邏輯與楊時無二，朱熹類似的分析還有很多，他及其他抱團的理學家的論斷，將新學新黨推入不復之地。若論官方禁燬，新舊黨文學受到的打擊相當，但新學遭遇蔡京、秦檜的歪曲利用，致新黨文字遭受牽連，破壞巨大；至於道學排擠「新學」，奪取顯學位置，對新黨心術文字採取「君子不道」的價值引導，致新黨無文無名傳世，影響尤烈。這種「不道」的後果，嚴重影響了後人對真實學術史、文學史的整理，使後人形成這樣的錯覺：舊黨一直爲主流公義擁戴、文學卓著；新黨文人爲姦邪小人時而妨道、無文傳世，並在這樣的錯覺下將新黨文學成就被遮蔽的狀態延續下去。

新黨文人文學被遮蔽的狀態在宋後固化下來，偶有文人發現他們的成就，並爲此驚歎，像胡應麟感歎：「李定、舒亶，世知其爲凶狡亡賴，而不知其皆留意文學。」〔註8〕可見新黨文人「凶狡亡賴」、不知文學的形象已深入人心，這當中既有學派的偏見，也有陳陳相因的言論累積。元人撰《宋史》「最推崇道學，而尤以朱元晦爲宗」〔註9〕，就認爲朱熹的論斷是「天下之公言」

〔註6〕 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八楊時第四頁，順治辛丑雲林銘刊本。

〔註7〕 朱熹《楚辭後語》卷六《寄蔡氏女》第四十七，《楚辭集注》，第229頁。

〔註8〕 胡應麟《詩藪》雜編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15頁。

〔註9〕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八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94頁。

〔註10〕，著史專取舊黨文人言論，對舊黨歪曲新黨文人的筆記材料直接取用，甚至將九名新黨文人列入《姦臣傳》。被視為亂臣賊子、姦佞小人及相關人物的思想言論、詩文創作違論保存、研究。在理學獨尊的明清兩代，這一現象更不可能得到改變，像四庫館臣論王安石就直接以朱熹的論斷為準：「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似）。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斯誠千古之定評矣。」〔註11〕政治、文學雖處於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但因為文人參政的緣故，他們的言論命運也與政治緊緊捆綁在一起，有些被捧上神壇，成為思想獨裁的工具，有些因為政治業績被權力話語所否定，進而生平事蹟湮沒，文學、學術被否定，這是自古政治權力凌駕於文學、學術的一條邏輯，因人廢言，在文學史對新黨文人的遮蔽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第二節 正名的迫切與困境

北宋新黨文人這一群體，從南宋以來，受到的正面評價遠遠未能與他們的成就相匹配。正如蔡上翔指出那樣，「荊公受謗七百有餘年」〔註12〕，其《臨川集》紹興十年重刻已有浙閩二本，卷數互異，其他新黨文人被視為姦邪小人，他們的文學作品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存，被文學史遺忘也是自然的了。從歷史的真實和被遮蔽的差距看，為新黨文人正名，對新黨文人整個群體到各個個體進行充分的研究是有迫切的需求的。從文學史的研究現狀看，也決定了不能以偏概全，僅研究舊黨文人文學，以之反映北宋中後期士大夫生活命運、思想修養、文藝學術的整體全貌。北宋中後期文學的發展，肯定也有活躍在政壇上新黨文人的參與建樹，他們的文學創作、評論是有突出的成就還是不值一提，與舊黨文人文學有什麼異同，對當時的文壇起到什麼影響？當然需要深入考察，還原歷史，而不是繼續保留空白或過分拔高。作為一個政治群體，新黨文人在文學上未必如政治上一樣有共同傾向，有群體特徵，但是作為一個同有被遮蔽命運的群體，搜集現存有限的文獻，尊重歷史的真實，給予他們客觀合理的評價，分析他們之間的異同，辨別他們的創新與守

〔註10〕 脫脫等《宋史》卷327《王安石傳》，中華書局，1977年，第10548頁。

〔註1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臨川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冊，第135頁。

〔註12〕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65頁。

舊之處，對於為新黨文人正名，對於文學史的書寫，是迫切的需要。

新黨文人的界定，與新法、黨爭緊密聯繫，它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首先，作為相對激進的變革派，他們在變革的意識，變革的方向、設想，對新法的支持上，有相近之處；其次，在熙豐變法中扮演的角色，有言論上捍衛支持者，參與建設決策者，推動實行法令者之分，既有緊密聯繫也有所區別；其三，政治立場的變化，熙豐間倡導新法的文人，可能在哲、徽朝有改弦易轍者，而哲、徽朝打著新法旗號的文人，未必符合新法初衷，從影響力、持續性等因素考察，應以熙豐間支持新法並能在黨爭中堅持個人立場的文人為主要研究對象。此外，以黨爭為參考，熙豐年間受舊黨人物攻擊，元祐四年五月被榜之朝堂，被指為王安石、呂惠卿、蔡確親黨，主持支持「紹述」，甚至被蔡京列入崇寧三年黨籍的部分文人是界定新黨文人的重要條件。必須指出，新黨文人眾多，本研究的新黨文人以任職中央的上層新黨文人為主體，對於在基層推行新法的下層官員，限於材料不足，故不列入考察。此外，宋代多以文臣任武職，研究對象有部分文人曾任過武職的，不影響我們稱之為文人。

近年來，學界對北宋黨爭與政治、黨爭與文學的關係研究，碩果累累，但是，這類研究中，無論是歷史、政治，還是文學研究，都主要圍繞黨爭事件去展開論述，具體到文人文學的研究，也集中在王安石身上，對其他新黨文人只是連帶關注，獨立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文學創作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的研究較為完備了，但是文學創作主體和文學作品的研究還有待深入，辨析長期以來連篇累牘的批判、從有限的文獻去考證事實，需要謹慎客觀，才不至於犯了為正名而過分拔高的錯誤。總的來說，目前與本書相關的歷史、政治研究和文學研究如下，歷史政治研究因為論述豐富，僅擇要簡述，對新黨文人文學的集中研究，截至本書再次修改，又有新的研究成果，都將予以呈現。

一、歷史、政治研究

近代以來，國內外史學界關於熙豐變法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據學者統計，僅在 20 世紀，單是「研究、評議王安石的傳記、變法史實的傳記、變法史實的著作」便達 90 餘種，發表論文千餘篇〔註 13〕。但是研究新黨文人群體

〔註 13〕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 頁。

的成果，數量較少，且尚未系統地展開，這方面相關的研究主要有：梁啓超的《王安石傳》第十八章略考論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凡 39 人〔註 14〕，當中大部分都是新黨文人，梁啓超對他們的政績品格大多作出了正面的評價，並且指出了史書傳記對他們生平記載、評論的錯漏之處。羅家祥的《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在圍繞政治與黨爭展開論述時，對新舊黨人的政見、矛盾等作出了客觀的評價，指出一向受史書稱揚的舊黨文人徇私苟且、滅裂偏激的弊端，肯定了新黨文人的才能和品德；此外，2008 年湖南師範大學羅煜的碩士論文《「熙豐新黨」考》界定了「熙豐新黨」的概念，並從熙寧、元豐間的宰輔、三司使、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中遴選出熙豐黨人，根據這些人物的參政事蹟，劃定一個在改革中作用突出、影響較大的政黨。

對新黨文人個體在變法、黨爭中的歷史研究，除了集中在王安石身上外，也側重了呂惠卿、章惇、蔡確、沈括、曾布、蔡京等幾個與重大歷史事件關係密切的文人。

對王安石的研究：李華瑞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史》一書已經對九百年來王安石及熙豐變法的研究史做了詳細的梳理，並仔細辨析了各類專家論著的研究方法、特點及異同，本書不重複論述。在王安石研究中必備的文獻有：宋詹大和的《王荊文公年譜》、清顧棟高的《王荊國文公年譜附遺事》和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這三種書對王安石的生平事蹟以及部分文學創作的考述審慎，被收入中華書局 1994 年裴汝誠點校本《王安石年譜三種》。此外，梁啓超的《王荊公傳》運用近代學術眼光去評價王安石及其推行的新法，批駁了史書多處不實之處；鄧廣銘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也在史料辨偽和考證方面著力〔註 15〕，肯定了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和思想品格；漆俠的《王安石變法》（增訂本）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研究的基礎上增補了新論〔註 16〕，作者以紮實的經濟史研究基礎，對新法作了充分的分析。這三部著作是近現代研究王安石政治生涯的重要作品，也是我們對王安石文學創作展開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對呂惠卿的研究：汪征魯主編的《呂惠卿研究》收錄有關呂惠卿研究的學術論文 50 篇，這些論文就呂惠卿與王安石的關係、呂惠卿在變法中的作用、

〔註 14〕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 7 冊《王荊公》，中華書局，1989 年，第 163 頁。

〔註 15〕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註 16〕 漆俠《王安石變法》（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呂惠卿的政治才能、學術水平以及家族世系等問題展開探討。其中，為呂惠卿翻案的成果較多，比較突出的論文有高紀春的《關於呂惠卿與王安石關係的幾點考辨》，辨析了有關王、呂交惡的史料〔註17〕，認為「皆緣國是」的爭端才是王、呂矛盾所在，而非大量史料指出的二人品行不端的緣故；呂一燃的《呂惠卿與王安石變法》分析了史籍中呂惠卿被歪曲的形象〔註18〕，並作出辨偽，肯定了呂惠卿在熙豐變法中制定推行新法、排除阻力、穩定局面的傑出貢獻。這些論著，對我們在史料辨偽和重新認識新黨文人的工作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

對章惇的研究：對章惇的研究相對較少，大部分論文都考論了章惇在變法中的建設事蹟，指出他的政治才能和優良品質，為章惇翻案，認為他不應被列入《宋史》的《姦臣傳》，其中，陳玉潔的《試論章惇》〔註19〕、李濟民的《略論章惇》〔註20〕、喻朝剛的《章惇論》〔註21〕，就是這一類文章。黃錦君的《章惇歷官年譜》、《章惇傳論——從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後期政治風雲》〔註22〕兩篇文章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對章惇的政治生涯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論，是近年研究章惇的力作。

對蔡確的研究：在相關的黨爭、政治研究中，對致蔡確於死地的「車蓋亭詩案」文字獄研究較多，認為蔡確遭罪出於舊黨的極端迫害，以這一事件為北宋黨爭走向極端化的開端〔註23〕，但對蔡確其他政治活動的研究相對較少。2006年河北大學孫澤娟的碩士論文《蔡確研究》對蔡確進行了史學專題研究，詳細考論了蔡確生平，分析了其前期對變法的貢獻和後期政治表現上的不足。

對曾布的研究：針對北宋歷史研究的熱點，大多數論文都集中討論曾布熙豐間市易司事件和哲、徽朝提倡中立的政治活動，如沈履偉的《曾布與熙

〔註17〕 高紀春《關於呂惠卿與王安石關係的幾點考辨》，《河北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9月。

〔註18〕 呂一燃《呂惠卿與王安石變法》，《史學月刊》，2003年第2期。

〔註19〕 陳玉潔《試論章惇》，《河南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

〔註20〕 李濟民《略論章惇》，《唐都學刊》，1988年第4期。

〔註21〕 喻朝剛《章惇論》，《史學集刊》，1997年第1期。

〔註22〕 黃錦君《章惇歷官年譜》，《宋代文化研究》第八輯，巴蜀書社，1999年；《章惇傳論——從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後期政治風雲》，《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輯，2000年。

〔註23〕 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